



2017年诗歌:

影响的剖析与内在生成

□霍俊明

对新一年的诗歌,我们并不一定能如预期的那样看到新质和新变,而我们又总是期待着新的一年与旧的一年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正是文学“进化论”在作祟,而忽视了文学的内在规定性以及新质生成的复杂性和缓慢性。

当下的诗歌生态因为处于变动性结构,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当下诗歌显然已经成了庞然大物,诗歌人口和诗歌产量巨大到超乎想象,各种言论、行为、活动等现象花样翻新且层出不穷。诗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对诗歌运动和活动热潮的追赴已成不争事实,与此热闹的诗歌狂欢节形成极大反差的则是诗歌自身建设(体式、语言、修辞、文体意识)却并未被如此集中和严肃地谈论。

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剖析

影响的焦虑或剖析一直在陪伴着100年来的汉语新诗,这涉及到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是王家新对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述评和回望。这似乎构成了现代汉诗不言自明的显性传统,但是诗人们似乎仍然羞于或不肯对那些影响了自己的汉语诗人和汉语诗歌传统说出赞美之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人诗选》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一种新的诗歌传统和诗歌前景”,在杨庆祥看来,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开启了一种对话式写作。两个月后,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另一个《新五人诗选》(臧棣、张执浩、雷平阳、陈先发、余怒),该书同样体现了经典化的意识,“对一个时期的诗歌状况做出评价的预期”。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在2017年成为一个不断凝聚的增生点和讨论热点。这不仅指涉百年新诗的体制、诗歌文化、资源传统、诗歌政治、诗歌精神、诗歌生态、诗歌史叙事,还涉及对100年现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评估。2017年1月初,诗人食指在《百年新诗路在何方?就在脚下》一文的最后写道:“我看到

网上推选的新诗百年的百名诗人,竟然连诗人贺敬之老师一字不提,深感震惊。”这涉及到百年新诗的传统、经典化和历史叙事,而这一过程由于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化语境的变动而充满了变动、波折和龃龉,甚至不乏戏剧性。谢冕就中国新诗100年发表论文《前进的和建设的》,提出百年新诗的传统、诗学革命、诗歌生态的变化,并强调诗歌不仅是大众的更是个人心灵自由的独特创造和独特表达。罗振亚指出百年新诗的发展极其艰难,不断被各种外因所“割裂”而还要承受各种批评和诘难(《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独”》)。陈仲义提取出了百年新诗的三个关键词“独”、“悖”、“惑”(《百年新诗:一“独”二“悖”三“惑”》),并且要厘清现代诗接受的误区从而确立标准(《重提现代诗接受的“标准”问题》)。柏桦的系列论文中讨论了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性和语言问题。李少君强调新诗的问题本身就事关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当下的诗词创作和研究以及传播也正在成为互相提升、砥砺的综合体,“诗词理论研究的突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优秀作品。而优秀的作品需要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和赏析。具有学理性的赏鉴或会心可读的点评,是优秀诗词进入研究视野的必由之路”。(袁行霈、杨志新、王贺《增强文化自信助推民族复兴 把中华传统诗词传承好发展好》)百年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单一横向移植西方诗学而自身诗学传统建构乏见的弊端。正如孙绍振在《学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尖锐指出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长期“失语”、研究者离开西方理论就变成“哑巴”。具体到2017年,在诗学建设的整体性上而言最大的收获无疑是敬东文的《感叹诗学》,“所谓感叹诗学,就是汉语诗歌必须以感叹为本质;汉语诗歌——无论现代还是古典——一切有可能出现或存在的其他特性,都建立在感叹的基础之上。”

正是注意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及愈益频繁的交互性影响,欧阳江河认为谈论“时代的大作品”除了当代诗歌汉语内部语境之外还得借助于由翻译、出版、传播以及国外诗界同行、媒体批评等“他者眼光”构成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机制(《当代诗与中间环节》)。“反思百年新诗,翻译诗歌这

一块,是绕不开去的重要话题——那样的一片‘深蓝’,与汉语诗歌原本的‘金黄’,邂逅、交集、反应、融合,方构成百年汉语新诗绿意葱茏之广原”(沈奇《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有关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的几点思考之“虚拟论文”的“引文”》)。胡桑在谈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汉语诗歌批评是强调了翻译、民族国家、现代性和传统这几个关键词,这呈现出世界文学图景中汉语诗歌的某种特征。当我们继续从国际和世界看待中国的诗歌,往往被强化出来的并不是内在的语言、修辞、技巧、想象力和形式感的缓慢变化以及相应的个人化特征,而是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性和社会学的眼光,比如美国学者龚浩敏的《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打工诗歌生态诗学:郑小琼诗歌中的自然、政治和性别》,强调了打工诗歌与田园主义的乡土诗歌传统的差异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生态现实以及农民工身份、家园生态诗学等。

当代中国诗歌是何种面目?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本土诗人的期待和焦虑。尽管近年来国际诗歌交流活动趋于井喷状态,但是活动中的诗歌与文本中的诗歌是两回事。

内在的规定性与隐秘生长

现在诗人和评论者以及那些微媒体上火热的参与者们都似乎对回到诗歌自身的问题丧失了耐心,这使得诗歌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而诗歌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文本”和“片面诗意”。民刊的重要性在新媒体和个体化写作的语境下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些民刊创办的初衷、过程和现状,以及不同时期的文本和诗人的精神生活史显现出了新诗的内在成长,《大家》在2017年第六期“诗江湖”推出九个民刊的专辑,对这一领域的关键问题做了记录和梳理。

诗歌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不只与技巧有关,更与诗人的情感、经验、知识、想象力、语言能力从业“道德”甚至精神场域相关。从诗歌的可能性、创造力以及内在性来说,我们呼唤的正是“诗歌的探险家”,正如臧棣所强调的“我的基本态度是,诗人还是要有点探险精神”(《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在当前批评界面向百年新诗整体性和宏大诗歌史的同时,也同样有研究者就诗歌的细部进行诗学层面的梳理、辨析,比如周伦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种方式》、王久辛《踏海索马里》、姚辉《欢乐颂》、剑男《春天十三章》、高春林《神农山纪事》、阳子《一块巨大的布》、安琪《凉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涛《在酿造车间》、蒋浩《夏天》、江雪《洛丽塔》、成路《活时间》、郑小琼《玫瑰庄园》、王琦《月牙泉》、马迎春《圣途》。刘立云的组诗《上甘岭》惊心动魄,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更多的人。”

牛艳莉则以“雪”的意象(场景)为中心,以微观化的切口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曙光、王家新、欧阳江河、沈苇、桑克、西渡等诗人在诗歌内蕴和技艺上的特征以及变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一个时期诗人的整体精神境遇、写作母题、思想旨趣和美学风貌(《“诗意”的拓展与“诗艺”的转型》)。沉稳的书斋型的新诗研究者则进行史料的爬梳工作,比如张立群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近40种徐志摩传记写作现状的考察以及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易彬对彭燕郊与施蛰存书信的钩沉、对穆旦“集外文章”的发现、讨论,姜红伟通过史料的搜集对海子热恋时期的10首“佚诗”的发现和考证工作,都对一个诗人的文本风貌以及一段诗歌历史的场域做了重要的补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也有诗评家对一贯的批评空白和短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开拓,比如汉语批评家一直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母语和双语写作处于失语的状态,或者笼统地纳入到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问题中去,大而无当,无的放矢。张清华则在对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诗选《燃烧的麦穗》阅读的基础上对维吾尔诗人的创作进行了诗性而准确的分析,他的感受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2017年较为醒目的是一些长诗和主题性组诗的写作,如吉狄马加《献给妈妈的十四行诗》、柏桦《竹笑:同芥川龙之介东游》、陈东东《序曲》、梁晓明《死亡八首》、陈先发的“九章”系列、周伦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种方式》、王久辛《踏海索马里》、姚辉《欢乐颂》、剑男《春天十三章》、高春林《神农山纪事》、阳子《一块巨大的布》、安琪《凉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涛《在酿造车间》、蒋浩《夏天》、江雪《洛丽塔》、成路《活时间》、郑小琼《玫瑰庄园》、王琦《月牙泉》、马迎春《圣途》。刘立云的组诗《上甘岭》惊心动魄,

“我认为,一个诗人的心脏理应更大一些,理应有一定的纵深感;跳起来,也应该更强劲。面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果我们的诗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可能难逃苍白的命运。”(《回望一场战争》)为总结当下的长诗写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专门举办“新时代新史诗与长诗创作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是在史诗式微的时代诗人的总体感知至为重要,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已经失控的时代。欧阳江河一篇文章中认为“大国写作”需要“长诗”的“大格局”与之匹配(《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而就我的阅读观感,当下写作长诗的诗人并不在少数,但一些长诗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诗的简单拼贴,而没有任何纵深的架构和整体可言。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这既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又是整体的时代大势。诗歌在内质上首先是面向自我的,是对经验、语言和命运的交代,是诗歌内在性的缓慢生长,然而诗人与生活、现实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处理在当下显然发生了问题,“启示性的写作,恐怕还是要在个人的镇定和时代的喧嚣之间找到一种张力的平衡”(臧棣《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更多的人,这是对自我精神的维护,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唤醒,哪怕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收窄”的“紧缩”的悲欣交集的感受。

诗歌是面向自我的,也是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未来的。在诗歌教育上,在面对未来的向度上,2017年度最大的收获是树才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蒋一谈的《给孩子的截句》。树才说:“诗是生命自身闪耀着的光。光的源头呢?就是那颗童心。”

时代的喧嚣与浮躁是一种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制和纠偏,诗人应该有从喧嚣中脱身而出的能力,应该有沉静下来、慢下来的定力,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诗才可能距离永恒更近一些,也算尽到了一位诗人的本分。

喧嚣的,沉实的,朝向永恒的

□王士强

中国诗歌的体量已经如此之大、人员如此之多,诗歌现场如此活跃、热闹,这一年定然会有重要的诗人、诗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成为未来诗歌史上或长或短的一个段落。面对年度诗歌这一庞大而复杂的言说对象,难免挂一漏万、言不及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试图从纷繁的现象与海量的信息中抽取出几条“线索”,编织成关于这一年诗歌的一种图景或修辞,“全面”与“客观”是一个理想和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是尽力而为。

“新诗百年”:反思与再出发

如果以胡适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到2017年恰好是100年。所以这一年关于“新诗百年”或“百年新诗”的相关活动非常密集,“新诗百年”同样暗含着一种焦虑,希望通过百年的新诗进行盘点,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新诗的合法性作出证明,为新诗的经典化增砖添瓦。在这其中,“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是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该项目自2015年开始,每期一个主题,两年间在全国7个省18个市县举办了18场研讨活动,第19场以“中国女性新诗创作”为主题,第20场则为该系列活动的总结论坛。2017年,有关百年新诗的学术会议举办多场,如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等主办的“第九届当代诗学论坛·百年新诗:历史变迁与空间共生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传承与变革: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国际会议”,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等主办的“新诗百年与校园写作”研讨会,11月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等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等等。“新诗百年”的书籍出版方面,较大型的是由中国作协与《诗刊》编辑部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以及由周良沛主编的《中国百年新诗选》。“新诗百年”相关的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刊物专题、诗集出版、理论研讨,也有诗会、诗歌评奖、诗歌展、诗歌朗诵等形式,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

“新诗百年”的相关活动对于活跃诗歌气氛、扩大诗歌影响、总结新诗成就、廓清相关问题等是有益的,当然,也应该看到某些活动中流于形式、自我加冕等问题。百年新诗走到现在,取得了

卓越的历史成就,但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影响力的衰微、视野的窄狭、圈子化严重、独立性不足、被消费逻辑所同化等等,说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新诗百年”的活动如果能够促生中国新诗的反思品质、对话精神,使其打开新的可能性,走向更为开阔、自律、从容的境地,无疑是值得期待和欣喜的。

诗歌节、诗歌奖:繁荣及背后

当今中国诗歌体量巨大,新诗、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据说是数百万之巨,每年的创作、发表数量则更为庞大、不可胜数。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各种诗会、诗歌节、诗歌奖等活动都非常多,足可作为当今诗歌“繁荣”之表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各级政府对于文化的重视,诗歌这一体裁备受青睐,官方、社会、民间等的各种资本投入到诗歌活动之中,可谓热闹非凡。这一年,较大型的诗会、诗歌节即有中国诗歌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海国际诗歌节、上海市市民诗歌节、中国天津诗歌节、中国(青岛)诗歌节、武汉诗歌节、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南方诗歌节、李白诗歌节、桃花潭国际诗歌周、成都国际诗歌周、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等等。

诗歌奖方面,现在的诗歌奖多种多样,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各不相同,“一个人的诗歌奖”水准不一定低,一些名头响亮的机构评出来的诗歌奖却也不一定靠谱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应该相信,时间是公正的,尊重诗歌者,必将获得诗界的认可,亵渎诗歌者,众人的眼睛也不会被轻易蒙蔽。2017年度的诗歌奖择其要者: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于坚、陈先发分获年度杰出作家、年度诗人奖;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郑敏获中国诗人奖,屠岸获诗歌交流奖;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蓝蓝获诗人奖,傅浩、刘文飞获翻译奖,张清华获诗学奖;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罗羽、敬东分获诗人奖、评论家奖;第二届“建安文学奖”,雷平阳、肖水获诗歌奖,罗振亚获评论奖。

诗歌活动方面另外一个较明显的是“国际化”的增强。今年的诗会、诗歌节“国际化”已近平时,成为“高端”活动之“标配”。本年,除了前面所列的诸多国际诗歌节、诗歌周之外,还有

“2017中美诗人互译互访”、2017“中美诗学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跨越语言的诗意·诗歌翻译工作坊”第四季、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2017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等。这些活动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作为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诗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诗歌”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系统,而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诗歌活动的“国际化”对于中国诗歌扩大国际影响力是有益的,与中国经济实力、国力的增强等自然也有关系。

这些活动的确昭示着诗歌的活跃与繁荣,对于推介优秀的诗人诗作、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拉近诗歌与公众的距离、提升公众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等是有益的,这些作用均显而易见,毋庸赘言。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繁荣有时也是值得审视、应该打上引号的。因为一些诗歌活动的主角并不是诗歌和诗人,其背后可能是功利的考量,一些活动以诗歌之名实际是在消费诗歌、利用诗歌,诗人沦为点缀或道具,诗歌并未真正地发出声音,这样的诗歌活动无疑是没多少建设性,意义不大的。

创作评论:静水流深,呈示自我

就诗歌创作而言,一年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明显的“转向”或“转折”,它更多的是在此前方向上的展开和深化。当代诗已极其多元、丰富,内部充满差异性:口语的、意象的、抒情的;现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语言的、生存的;学院的、民间的;智性的、及物的;主流的、边缘的;性别、地域的……“五花八门”、难以尽数。诗歌界“圈子”众多,“派系”林立。除却过于狭隘化、情绪化、意气用事等的缺憾之外,这样的情况却也正常,契合诗歌的自由品质。如果整个诗坛一团和气、彼此都写同一种诗,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圆熟,恐怕都是令人乏味的,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固然混乱有之,低水平重复有之,混水摸鱼滥竽充数有之,但却也是有活力、有成长性,包含着可能性的,正如诗人朵渔所说“不团结就是力量”。2017年,诗人们在进一步走向“四面八方”,各个呈现着不同的自己。“60后”、“70后”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富创造性和平影响力、整体水准最高的。当然,如果说说到诗歌的“变化”,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年轻诗人那里。而今

的年轻诗人写作的起点更高,接触的信息更多,想象力丰富,对于时代变化的体察更为敏锐,他们的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诗歌新美学的。有诸多刊物对年轻作者予以关注,《作品》杂志设置“推手·90后推90后”栏目助力“90后”写作,《草堂》诗刊设置“最青春”栏目,主要发表“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则专辟“90后”栏目,2017年发表了庄凌、炎石、颜彦、李昀璐等“90后”作者的诗歌作品。

2017年8月,第33届青春诗会在甘肃举行,《诗刊》社为15位青年诗人每人出版一本诗集。霍俊明主编的《中国好诗》第三季出版,李南、梁晓明、胡弦、叶舟、何向阳、荣荣、姜念光、蓝野、白庆国、严彬的10本诗集入选。此外,雷平阳的《击壤歌》、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张执浩的《神的家里全是人》、毛子的《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梁平的《家谱》、韩文戈的《万物生》、潘洗尘的《这是我一直爱着的黑夜》、蓝蓝的《唱吧,悲伤》均厚重而独异,有着较高品质。

诗歌评论方面,有数本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特色的评论文集出版,如张清华的《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敬东文的《感叹诗学》、李犁的《烹诗》、霍俊明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等,均形成了个人化的语体风格和观念体系,各有“独门密技”、卓尔不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学人文库”的“70后”诗歌批评家文丛”推出陈卫、刘波、熊辉、易彬、张立群、王士强六人的评论集,是对“70后”诗歌研究者的一次集中推介。

AI写诗与“底层写作”

2017年,AI写诗并出版诗集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5月19日,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庐文化在北京发布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著作者为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AI写诗在诗歌界引起了一时热议,大多数人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缺乏灵性、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其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词语的随意组合,是语言的游戏和空转,即使可以称为诗也难称好诗。不过也有诗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今

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实际上,仅就现实性而言,微软小冰的出现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个镜鉴,小冰写得固然还不够好,但是写得还不如小冰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小冰的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替代这一部分写作者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提高了现代诗的门槛,对诗歌写作和诗歌写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写诗代表了现代高科技进行诗歌创作的可能,比较“高端”,现实之中还有处于“低端”的为数众多的“底层写作者”。“底层写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收入100余位“北漂”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的“漂”对具体个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一行动重新提出了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面对现实以及当今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2017年末,由《作品》杂志社组织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广东举行。AI写诗和底层写作一定意义上可以构成一个象征,代表了当今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资本与权利、发展与生存、自由与伦理……它们构成了无比复杂、立体、混沌的“现在”,而“未来”也必然与此有关。这同样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这一年,诗人罗门、余光中、屠岸先后去世。他们都是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诗歌老人,参与和见证了新诗的历史,他们的离去使中国新诗的某些重要区块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好在诗人还有作品留在人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命仍在。人的生命终归有限,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那些为人为诗俱好、人与诗相统一的,其人其诗之间会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反之,则会有一种消解、递减的效应。这是对我们时代诗人的一种提醒,也是常言所说“敬诗先做人”,“欲为诗,先修德”的道理。余光中曾说诗人的工作是“与永恒拔河”,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其实都应该是朝向永恒的,“与永恒拔河”。时代的喧嚣与浮躁是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制和纠偏,诗人